

# 從書寫到譯寫： 跨語脈絡下的張愛玲長篇英文小說《雷峰塔》、 《易經》<sup>▲</sup>

趙家琦\*\*

## 摘 要

本文以張愛玲（1920-1995）的長篇小說 *The Fall of the Pagoda* 與 *The Book of Change*（《雷峰塔》、《易經》，簡稱《雷》、《易》）為對象，關注張以英文來處理中國題材的表現，並探討該部小說在內、外緣脈絡的文化譯寫向度。本文首先耙梳《雷》與《易》裡的儒、道意象，析論張將主角的成長故事，鑲嵌進傳統文化觀的象徵意涵。並從張寫於 1960 年代的〈自介〉一文，探討張以檢視西方讀者對中國的認知偏見，及其借鑑自新文學的剖白，為呼應著她在《雷》、《易》裡以非美化之筆，來揭示民初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敘事表現。最後，勘查收錄〈自介〉的《世界作家》叢書，指出該書以「世界」概念來詮釋張愛玲作品的中國特點，足以折射《雷》、《易》的文化譯寫定位與價值。

**關鍵詞：**張愛玲、《雷峰塔》、《易經》、文化譯寫、《世界作家》

---

<sup>▲</sup> 本文為本人 110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跨語際／境的東方敘事：張愛玲長篇自傳性小說的文學譯寫與文化譯寫」（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05-046-）部份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口頭發表於“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Ancient and New Silk Roads: Discourses and Knowledge”, Montpellier, France: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 Montpellier III. 2021. Nov. 18-20，感謝會上學者的賜教。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就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讓本人得以修正與補充未善之處，在此致上深摯謝忱。

<sup>\*\*</sup>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西元 2009 年對「張學」研究是標誌性的一年，因為此年張愛玲（1920-1995）的自傳性小說「遺作」《小團圓》出版。<sup>1</sup>作為張愛玲原擬「銷毀」<sup>2</sup>又重獲天日的作品，《小團圓》述及的母女關係與男女情／性事，不僅引發讀者對於張愛玲個人隱私與情感世界的好奇與窺探，而該書在筆法風格上有別張盛名之作的特殊性，亦引起研究者對於張愛玲後期寫作及其特點的關注與討論。後一年，同樣為張氏長篇英文自傳性小說的 *The Fall of the Pagoda* 與 *The Book of Change*（簡稱 *Pagoda*、*Change*）及其中譯本《雷峰塔》與《易經》（簡稱《雷》、《易》）出版，<sup>3</sup>然而其引發迴響卻遠不如前一年備受矚目的《小團圓》。

儘管《雷》與《易》出版於《小團圓》之後，但此兩冊合卷的英文小說卻是《小團圓》的前身，且其寫作時間可溯及張愛玲赴美初期的 1950 年代中葉。如 1957 年，寓美約兩年的張在致友信中提到「正在寫的長篇是關於自己的事」；<sup>4</sup>餘月後表示已擬好寫作大綱，「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後倒敘轉入「童年回憶」，再插敘接回港戰，後「自港回滬」，下接「胡蘭成的事」到 1947 年為止<sup>5</sup>，而此草擬大綱幾乎等同日後《小團圓》的敘事架構。至 1961 年，張愛玲已設想好該作題名，預計取為 *The Book of Change*，篇幅為原先架構的一半。<sup>6</sup>越兩年，該書幾定，張愛玲致友信中再度提到幾個重要創作節點：一、決定將該作由英文「譯出」（筆者按：即譯成中文）；二、因該作篇幅長，張預計將上半部抽出，另以《雷峰塔倒了》為名；三、張並透露該作即是早年自傳性散文〈私語〉的延伸，故其自認此題材對中文讀者可能「一望而知」，但她則是「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並已將稿件「東投西投」至美國出版界。<sup>7</sup>

據上所陳，無論是根據其早年自傳性散文的延伸擴寫，或是作為《小團圓》的前身底稿，《雷》、《易》顯然在張愛玲的自傳性書寫脈絡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迄今不少論者便聚焦於該部小說與張愛玲自傳性寫作的關聯。如有論者注意到張在小說裡採取第一人稱的童女視角，指出該視角投射了張對於童年陰影與成長創傷之未結／解，使《雷》可視為張愛玲「前傳」與其寫作治療文本，並足以折射張氏後半生精神執魅之根結。<sup>8</sup>同樣關注到

<sup>1</sup> 宋以朗：〈《小團圓》前言〉，收於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2010），頁 3-17。

<sup>2</sup> 見張 1992 年 2 月 25 日致宋淇（1919-196）信中附寄遺囑。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I，1980-1995》（臺北：皇冠，2020），頁 484。

<sup>3</sup> Eileen Ch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The Book of Cha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張愛玲著，趙丕慧譯：《雷峰塔》（臺北：皇冠，2020）；《易經》（臺北：皇冠，2010）。以上為本文引文所據版本來源。

<sup>4</sup> 張 1957 年 8 月 4 日信。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1955-1979》（臺北：皇冠，2020），頁 68。

<sup>5</sup> 張 1957 年 9 月 5 日信。同前註，頁 70。

<sup>6</sup> 張 1961 年 2 月 21 日信。同前註，頁 99-100。

<sup>7</sup> 張 1963 年 6 月 23 日信。同前註，頁 111-112。

<sup>8</sup> 張瑞芬：〈童女的歧途——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收於張愛玲著，趙丕慧譯：《易經》，頁 9-18；楊聯芬：〈成長創傷與家族史書寫——談新近出版的張愛玲自傳小說《雷峰塔》、《易經》〉，《中國圖書評論》第 7 期（2011），頁 72-76。

《雷》、《易》裡的成長題材，亦有論者指張在小說裡對家族隱晦瑣事的娓娓陳述，體現了張歷來以家庭運動為母題的循環自白性寫作；<sup>9</sup>或是以張在書中鋪寫的母女關係，論指小說主角所隱含張自喻戀母、審母到弑母的多重情結，及其反映五四以降新女性面臨的倫理困境。<sup>10</sup>

另外，則有論者將《雷》、《易》比對張愛玲早期具自傳性質的跨文類寫作文本，分析該部小說在張氏自傳性作品中的特殊性。如針對《雷》，論者便將該作溯及張氏 1940 年代散文〈私語〉等篇目，論指後者展現了張成名初期以引入身世話題的表演性書寫，前者則以結合風尚喜劇（comedy of manners）與哥德式驚悚小說（gothic thriller）的混雜風格，突顯張愛玲對書中家庭主題之矛盾與畸變，予以怪誕式的嘲弄。<sup>11</sup>至於《易》較之張寫於 1944 年的散文〈燼餘錄〉，雖少了後者對「錯綜的心理反應和道德曖昧性」<sup>12</sup>的暗寫，卻不乏以揭露之筆，鋪寫母女關係的矛盾。又論者並由《雷》、《易》的題名設計，論指張在《雷》裡以塔來喻擬新、舊時代下荒謬的中國社會，透露張對歷史幽影的執魅；《易》則顯露張以「易」的循環變異之意，喻寫主角在戰爭中的求生經驗來傳達「生命流變與人事興衰」的「輪迴辯證」。<sup>13</sup>論者並進一步將兩部文本合觀，指出《雷》與《易》顯示了張愛玲後期寫作具有「內傾式的迴旋話語」（involutionary discourse）的特點，以及她對五四以降講求啟蒙、進步與線性史觀的寫實敘事與國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的「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ct）。<sup>14</sup>

就《雷》、《易》具有迴旋、衍生與重複的敘述美學特質，論者並延伸論及張愛玲的跨語寫作所穿梭於中、英文的多重語言（multi-lingual）<sup>15</sup>實踐。如有論者認為張「在傳達人我關係的（不）可能性時」，「異國語言未必亞於母語」，使張的雙語寫作「如同一個激烈的辯論（polemic）」，既照見張在「中文語境裡本來就已邊緣化的存在（alienated existence）」<sup>16</sup>；並且張橫跨中、英跨語寫作的曖昧性，亦顯示其譯寫實踐未必是如實照翻，卻是流露

<sup>9</sup> 蘇偉貞：〈私語張愛玲：張愛玲的家庭劇場與家庭運動〉，《淡江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2），頁 119-154。

<sup>10</sup> 許閔淳：〈變異之外——論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中的「母女」關係〉（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8）。姚玳玟：〈沒有足夠的愛去克服兩個世界的鴻溝——從張愛玲的母女書寫看“五四”之後個人主義女性的倫理困境〉，收於楊聯芬主編，《性別與中國文化現代轉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頁 309-325。

<sup>11</sup>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現代中文學刊》第 6 期（2010），頁 76-77。

<sup>12</sup> 同前註，頁 81。

<sup>13</sup> 同前註，頁 82。

<sup>14</sup> 同前註，頁 80、75。亦可參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2007），頁 165-171。

<sup>15</sup>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同註 11，頁 85。

<sup>16</sup> 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The Fall of the Pagoda*, p. vii.

出不斷折衝於語言、文化、性別與時間領域的幽微。<sup>17</sup>

相較於將張愛玲的跨語寫作闡釋為具有隱喻性的迴旋與重複美學，另有論者則關注張在英文寫作上的技術表現，由此推論張在英文語境裡的接受情況。如有論者比對張就同一創作底本的中、英文版本，論析張在轉換中、英文之間的語言思辨過程。<sup>18</sup>或有論者指張氏英文作品具有的母語邏輯偏向，使張的英文寫作缺少一定流暢度，導致其在英文市場未能取得反響。<sup>19</sup>其他論者則注意到張的部份英文作品在選題與語言使用上具有的中國情調，指出張愛玲這些作品具有可觀的文化訴求向度。相關論點可見研究者指張赴美後以中國為題材的英文作品，展現了張訴諸中國「歷史賣點」<sup>20</sup>、「東方色彩」、「家族傳奇」與「女性人物」等特點來「誇張小說的異國情調」<sup>21</sup>及吸引英文讀者興趣。然而，亦有論者從作者本位的角度，認為張愛玲的英文寫作有意地以異化策略，展現了張以「最大程度保留了中國習語內在的文化涵義」來抵抗西方中心主義的企圖。<sup>22</sup>

從上述前沿研究可見，迄今就《雷》、《易》的討論，除了著眼於自傳性書寫的角度來論析張愛玲對自身成長經歷的反覆致意；另一主要探討方向，則是關注張以英文來處理中國題材的跨語寫作，當中或從語際層面，指出張在使用英文上具有中文語法的傾向，或將其並觀張在小說裡引入的中國文化元素，論指張這類挾帶中國訊息的英文作品，可能為刻意吸引英美讀者，抑或有著張抵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訴求。而概觀之，儘管上述的第二項觀點，已指出《雷》、《易》所顯示張愛玲在中、英跨語寫作上滲入的母語痕跡與中國文化訊息，但是針對該小說在文本內、外緣所存在更細部與複雜的文化交涉課題，以及張愛玲如何看待她在《雷》、《易》裡以跨語寫作帶來的文化傳譯意義，似乎仍存在著值得追探與挖掘的空間。

舉例來說，對於處理《雷》、《易》的中國題材，張愛玲便曾向友人表示，她有意不依循彼時多數英美讀者對東方題材的閱讀喜好主流，而是擬以「自己的故事」為素材，表露出其自身對中國題材的寫作，有著逸出西方讀者主觀視野的創作立場。<sup>23</sup>更值得注意的是，

<sup>17</sup> 王德威：〈此怨綿綿無絕期——從〈金鎖記〉到《怨女》〉，《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1998），頁379。

<sup>18</sup> 郭強生：〈張愛玲真的有「創作」英文小說嗎？〉，載《聯合文學》期311（2010），轉引自「郭強生的夜行部落」<http://blog.udn.com/jshengk/4679091>（訪問日期：2021年6月18日）。劉紹銘：〈張愛玲的中英互譯〉，《愛玲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頁92-116。

<sup>19</sup> 李歐梵：〈張愛玲的英文問題——張愛玲英文作品中融入中國元素的嘗試〉，《現代中文學刊》總第9期（2010），頁88-92。

<sup>20</sup> 王德威：〈此怨綿綿無絕期——從〈金鎖記〉到《怨女》〉，同註17，頁365；姚玳玫：〈冷戰格局中的個人安妥：張愛玲後期的文學書寫〉，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2018），頁197。

<sup>21</sup>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同註11，頁77。

<sup>22</sup> 張龍云：〈世界文學與中國經驗：張愛玲英文小說價值論〉，《江漢論壇》第7期（2021），頁107。

<sup>23</sup> 見1950年代中期，張表示《雷》、《易》要以「自己的故事」為素材，「有點像韓素音的書」，但她不

針對《雷》、《易》完成後在美出版受挫，張並在 1960 年代中期應出版社之邀寫的〈自介〉一文，尤以針對跨語境文化認知障礙的課題，提出她對 20 世紀早期中國的文化申論，以及她以新文學之民族批判敘事為借鑑對象的創作觀。並且，這些觀點又透過〈自介〉刊載的《世界作家》叢書與其傳播向度，突顯出張在《雷》、《易》裡的跨語寫作實踐，實有著她擴展域外讀者對中國之認知視野的文化譯寫企圖。

因此，著眼於張愛玲在《雷》、《易》裡以英文來處理中國題材的跨語寫作實踐，以及該作涉及的跨語境文化傳譯的課題，本文擬由前沿研究成果上，進一步探勘張在《雷》、《易》的文化譯寫表現，並由張對該作提出的創作陳述，探討該小說文本衍生的域外傳播與接收課題。然而，誠如論者所指張愛玲在《雷》、《易》裡「將中國人的生活、歷史、語言藝術」等「文化經驗」<sup>24</sup>作為其廣泛的譯寫內容，本文因篇幅考量，則擬以舉論方式，於第二節裡，集中探析張在《雷》、《易》裡援引的儒、道學說與意象，論指張有意地將小說主角的成長故事，鑲嵌進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概念的象徵意涵。第三節，則引入張 1960 年代為《世界作家》叢書撰寫的〈自介〉一文，論析張寫作《雷》、《易》的背景，既有著她欲以彌縫跨語境文化認知差距的動機，也有著她以新文學為標向，來弭除域外讀者對中國之認知偏見的文化譯寫立意。第四節，再以收錄〈自介〉的《世界作家》叢書為對象，觀察該書作為一體制化（institutional）的知識話語場，其如何以「世界」概念來詮釋張愛玲作品的中國特色，進而帶出張在《雷》、《易》裡以中國為題材的跨語寫作具有的文化傳譯向度。概言之，本文以《雷》、《易》為探討對象，並納入張愛玲的自述與相關衍播文本，旨在勘探該部小說具有的文化譯寫意義與價值。

## 二、雙重援引線索：

### 《雷峰塔》與《易經》的儒、道意象與文化指涉

作為合卷本小說，《雷》與《易》的故事內容，主要講述了女主角琵琶（Lute）的童年經歷，再到其青年時期留學外地，並在戰事爆發下返滬歸鄉的成長過程。對於熟悉張愛玲作品的讀者來說，《雷》、《易》所述內容，皆可在張寫於 1940 年代的自傳性散文裡找到相關線索。然而，張以「雷峰塔」與「易經」此具中國文化色彩的詞彙作為《雷》、《易》的

---

擬採韓氏作品的跨種族戀主題，而是自認「可以寫的比她好」。宋以朗主編，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張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2010），頁 48-49。1963 年完成《雷》、《易》後，張亦表該作不比西方的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此詞應為粵語，指哆嗦嘮叨）。見張 1963 年 6 月 23 日信，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1955-1979》，同註 4，頁 112。

<sup>24</sup> 張龍云：〈世界文學與中國經驗：張愛玲英文小說價值論〉，同註 22，頁 107。

標題，則顯示了她有意引入「雷峰塔」與「易經」為意象，在小說裡寄存進與兩者相關的特定文化意涵。

分述來論，《雷》的小說全名「雷峰塔倒了」，既是對小說時空背景的實指，亦有著文化涵義的象徵性。一方面，「雷峰塔倒了」即以現實中雷峰塔在西元 1924 年的「倒了」，指陳《雷》的故事語境為設定在民初時代。另一方面，雷峰塔的傾覆在歷史意義上，亦代表滿清皇權被革命黨推翻而共和體制的肇建，可見張用此意象來指涉其在《雷》所述民初政體變革造成社會體制的崩頹。此外，雷峰塔亦是中國民間傳說白蛇傳裡白蛇娘娘所受鎮壓之處，而其代表的保守勢力與禮教束縛，亦可說象徵了《雷》裡的主角受制於自身遺民家世的陰影而幽暗封閉的童年歲月。<sup>25</sup>

承上來論，塔在《雷》裡既指涉了政體變革的民初時代，亦在相當程度上象徵了主角的遺民家族身世。嘗有學者便針對遺民在《雷》裡作為關鍵性的主題，指出張在《雷》裡大幅度地以羅列家族官銜，既側寫清朝遺民的政治行事，亦從中影射現實中的遺民父祖。<sup>26</sup>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特定指稱，「遺民」除了是中國歷史上指涉前朝遺民的身份稱呼，該詞所涵攝有關家國創痛、政權認同、史觀取向與政治道德等課題，亦密切牽涉儒家教義與其承載的傳統文化觀念。或許正是著眼於「遺民」一詞與儒教義理的相關性，張愛玲在《雷》裡便極具暗示性地將小說中的遺民角色，描寫為與傳統儒教學說具有密切關聯的特定文化群體。

如在具體操作上，張在《雷》裡即以對主角父輩的角色塑造，彰顯這些人物形象與儒教義理的對應或關聯性。如小說裡的正面遺民典型以沈家的天津「二大爺」為代表，其不僅為農家背景苦讀出身的儒生智識，又其具道德操守與承繼儒教衣鉢的典範形象，更體現在他成為遺民後，不仕新朝而懷抱舊朝之思、抱窮守志的作為，因而被主角描寫為奉守「一種圓熟，真正的孔教的生活方式」（“a mellowness that came from a true Confucian way of life or at least very near it.”）。<sup>27</sup>對照之下，《雷》裡負面的遺民形象，則是出任北洋財政總長而住在「大房子」的沈六爺，以及其他入仕民國新朝而符應政治變通的主角父輩們。透過主角的敘述觀點，張愛玲突顯了這些新朝遺民在儒教遺教下面臨為官、為德與為／維生間的矛盾，亦對這些未合道德理想的遺民者作為，提出暗諷。如主角的雪漁表舊爺便是此類負面遺民代表，其作為滿清遺臣卻入職北洋政府，又其挪用公款引發的官司糾紛、政壇爭議與家醜紛擾，在在折射入仕遺民（與其家族親屬）扞詰在政治選擇、道德實踐與身份認同

<sup>25</sup>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同註 11，頁 79-80。

<sup>26</sup> 如書中的「二大爺」原型被指為張人駿（1846-1927），其為張愛玲祖父張佩綸（1848-1903）堂侄，曾任都察院御史與兩廣總督。高全之：〈《雷峰塔》與《易經》的遺民態度〉，《現代中國學刊》總第 26 期（2013），頁 34-38。

<sup>27</sup> 《雷》第 6 章，頁 77；Pagoda, p.51。為求精略，本文引述 *The Fall of the Pagoda, The Book of Change* 與其中譯本《雷峰塔》、《易經》的書名時，為使用簡稱。

的衝突與焦慮。<sup>28</sup>而入仕滿洲國的鶴伯伯（沈秋鶴）亦是讓主角家族蒙羞的汙點，其因現實利益考量的政治選擇，並透過主角引述《論語》的「學而優則仕」格言（“Confucian had said: Study and excel, and govern. It was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that all scholars graduate into government work.”）<sup>29</sup>，迂迴地諷刺其入仕行為即是對儒家訓示「學以致用」的悖離與反證。<sup>30</sup>

相較以上作為儒教遺民忠臣表率的沈二爺、或是有違儒家政治道德的雪漁表舅爺，小說主角父親沈榆溪則是《雷》裡在呈顯塔—遺民—父輩—儒教的連結關係上，別具代表性的人物。如《雷》裡敘及沈父處每每安插進儒教意象與典故，表現了張愛玲有意將該角色再現為受承儒教義理的傳統文人、卻又於道德實踐上有所落差的紈袴遺少；張亦尤其透過主角的敘述觀點，突顯傳統父系家長制（patriarchy）與儒教禮律威權（authority）的互喻性。如小說裡的代表段落，可見《雷》第七章以「先生來了！」（“Teacher’s coming!”）為開首的延師課子一節。當中，張愛玲描寫了在主角看來，塾師懲處學生用的「板子」既如宗教聖物（「聖骨」“holy relic”）、又像巫魔的原始法器（「原始巫師的枝」“a medicine man’s twig”），再現儒教權威如至上神權、卻又如法術般的異樣存在。同時，張並以大寫形式的「至聖先師」尊稱（“The Seat of the Great Accomplished Most Sacred Early Teacher”）<sup>31</sup>，突顯儒教以孔子為代表的崇高偉大，卻也描寫主角在拜師頂禮的儀式中對現實落拓塾師與孔子畫像尊容的落差，既諷刺這場敬師奉儒儀典的不合時宜，更從中暗示儒教規訓淪為主角父親作為權力替代物的空洞象徵意符。

此外，張愛玲並使用具中國文化意味的神魔意象與志怪修辭，從而將《雷》裡主角眼中家族父權與儒教威權的互喻性，再現為具有反諷意味的東方奇譚。此可見小說裡每每著墨主角視角下的父權空間，突顯後者縈繞著鴉片煙氣而如同佈滿怪誕（grotesque）與哥特驚悚氛圍的迷離禁地。<sup>32</sup>然而，張在《雷》裡則是將哥特文學用以突出心靈幻影與超自然禁忌的古堡與荒地，<sup>33</sup>置換為壓迫的儒教父權空間；其並將哥特敘事裡的閣樓瘋女（“the

<sup>28</sup> 參小說寫到羅雪漁被藍衣社槍殺涉及的漢奸嫌疑，引發主角姑母三人的羞愧默然：「三人都默不作聲，羞於漢奸之名。」（“All three felt silent at the disgrace of being killed for being a traitor.”）《易》第4章，頁73；*Change*, p. 47. 「羅雪漁」原型為李國杰（1881-1939），其為李鴻章（1823-1901）長孫。參高全之：《〈雷峰塔〉與《易經〉的遺民態度》，同註26，頁34-38。

<sup>29</sup> 《雷》第15章，頁211；*Pagoda*, p. 170.

<sup>30</sup> 張愛玲在小說裡使用的“Confucian”一詞，並未嚴格區辨該詞為指孔子學說或儒學義理支脈，故該詞在小說中應為概義用，泛指孔子為典範的儒家學說與儒教文化。

<sup>31</sup> 《雷》第7章，頁87-88；*Pagoda*, p. 60-61.

<sup>32</sup> 此可見原文形容父親房間繚繞著「藍色煙霧」（“blue smoke”），生父後母如「神」（“gods”）、亦如「魔」（“the Ox Demon King”），狀似「獸」（“beast”）、亦如「精」（“Princess Iron Fan”）。《雷》第7章，頁90；*Pagoda*, p. 64.

<sup>33</sup> [英] Fred Botting, “The Gothic Production of the Unconscious”, in *Spectral Readings: Towards a Gothic Geography*, eds. Glennis Byron and David Punter (London: Macmillan, 1999), pp. 11-36.

madwomen in the attic”），<sup>34</sup>取代為《雷》裡萎靡不振的封建遺少，在在突顯其轉化地將哥特文學的空間編排與性別角色設計，譯寫為回應晚清以降、圍繞於中國男體—病體—國體—儒教體制的國族批判論述與隱喻公式。<sup>35</sup>且在這一段落裡，張更引入《論語》格言「非人弘道，為道弘人」（“The Master said: ‘A man can enlarge the doctrine he follows; it is not the doctrine he follows that enlarge a man.’”）<sup>36</sup>，明顯地以對儒家訓言的引經據典，反諷主角父親在言教與身教的落差。

除了以儒家格言來反諷主角遺民父輩的道德缺失，張愛玲並進一步在小說裡多處，以主角第一人稱的獨白敘述，彰顯主角對儒教宗法體制與其形塑之國族文化傳統的質疑。此可見《雷》第二十三章寫到主角聽聞裸母的生母被孫子活埋的鄉野傳聞。當中，張描寫了主角初聞噩耗不可置信的內在獨白（「中國人不會做這種事」“This was not a Chinese thing”）<sup>37</sup>，從而將這則看似單一事件的活埋生人傳聞，指向為對悠久儒教傳統的批判式叩問：「二千五百年的孔夫子教誨，我們竟然做出這種事？」（“After twenty-five hundred years of Confucius have we come to this?”）在主角自稱「我們」、「中國人」所針對儒家傳統提出的反詰與激問語式中，張愛玲耐人尋味地反諷了這起弑親傳聞在小說文脈裡不僅是一則駭人聽聞的家庭悲劇，更是中國在千年儒教遺訓下，卻發生悖禮違仁的人倫慘劇與遭受的歷史文化共業。

將父輩遺民的道德墮落與鄉間弑親事件，歸結到儒教體制潛在的弊端，亦可見小說裡以主角的第一人稱敘述，突顯其對自身所屬國族文化的認同危機。如《雷》第十五章寫到民初政局的混亂與社會傾軋，便以主角對時代亂象的自問自答，傳達出中國在其看來即如父祖遺民一代的食古不化與老衰：「中國是什麼樣子？代表中國的是她父親、舅舅、鶴伯伯、所有的老太太……。」（“What was China like? To her the ones that stood for China were her father, Uncle Pillar, Uncle Crane and all the old ladies……”）<sup>38</sup>。張並著墨主角對遺民身世的溯問，進而提出對傳統儒家君親制度的質疑。如《易》開頭處敘及主角因好奇而閱讀祖輩詩集，然而這一看似確認血脈親緣的情節，描寫的不是主角讀到祖父詩集裡感人的真實性情，卻是臣子附應皇權的「奴顏婢膝」（“the conventional grovelings and hosannas at every reference to the throne”）<sup>39</sup>。此將祖父詩集再現為封建皇權下的虛應產物與禮教浮文，亦反映在主角將父祖的頌書習慣，詮釋為與現實脫節的國族文化積習：「她因此老氣橫秋，與世

<sup>34</sup> 此詞借引自〔美〕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書名。

<sup>35</sup> 顏健富：〈「國民」想像：從晚清到魯迅小說的「新中國」與「鐵屋子」〉，《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245-280。

<sup>36</sup> 《雷》第7章，頁90；Pagoda, p. 64.

<sup>37</sup> 《雷》第23章，頁324；Pagoda, p. 269.

<sup>38</sup> 《雷》第15章，頁212；Pagoda, p. 171.

<sup>39</sup> 《易》第2章，頁37；Change, p. 16.



上最多記憶包袱的國家同聲一氣」(“It had aged her and joined her to the country, the most memory-ridden in the world.”)<sup>40</sup>在作者筆下，頌書所表現對先賢教義的尊崇與複誦，彰顯的不再是傳統智慧的延續，卻是突出了主角被迫成長於儒教綱常體制而難以掙脫的文化包袱。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雷》後半部以主角逃出父親家與父輩人物的陸續死亡，象徵著主角因「弑父」<sup>41</sup>而得以重生的成長艱辛；小說裡亦引入伯夷叔齊此深富儒教義理意味的歷史典故，<sup>42</sup>以描寫主角由此典故所引發對儒教精神遺產的省思，帶出她對於身為遺民後代的重新定位。如在原文裡，主角憶起童年初上私塾，聽聞教師講授伯夷叔齊事典而淚流。而作為一暗喻性的情節，主角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悲切共鳴，不僅反襯其聽聞伯父未持德性操守，最終落魄至窮死、進而餓死的荒謬性；但對主角來說，其由伯夷叔齊事典所觀仰到儒教先賢堅守舊志的人格典範，也讓她得以自我寬慰自身雖為舊時代之遺孤，卻有著秉持與隱守理想的堅韌情懷：

第一堂歷史課是武王伐紂。商朝宗室伯夷叔齊這對兄弟不仕新朝，……倒像是什麼前兆，凡是不願意隨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her first tutor had begun with the founding of Chou Dynasty after Shang was overthrown. Two brothers, Bai-yi and Shu-chi, clansmen of Shang, had refused to go over to the new dynasty,……she thought it had been a premonition of the loneliness to those who went against the drift of the world.”)<sup>43</sup>

可以這樣說，伯夷叔齊的典故在《雷》與《易》裡標示著故事主軸的轉折點，因其不僅表徵了主角就父系遺民身世予以回顧式的總結，又其下接的老子學說，並展現主角的精神啟蒙對象由儒至道的典範轉移。如援引伯夷叔齊的典故之後，主角緊接敘及了她閱覽到胡適（1891-1962）研究商遺民老子的論文。<sup>44</sup>而對主角來說，老子在胡適觀點裡被視為承繼商遺民血脈所執守「宗室利用古老傳統與祭祀的知識謀生」(“made a living on their knowledge of old fashion and priestcraft”)，既讓她由觀照「餓死」的伯夷叔齊到「求生」的老子哲學，

<sup>40</sup> 《易》第2章，頁43；Change, p. 21.

<sup>41</sup> 林幸謙：〈張愛玲的女性敘述及其反父權策略的書寫〉，《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臺北：洪葉文化，2000），頁119-206。

<sup>42</sup> 林聰舜：〈伯夷叔齊怨邪悲邪？：天道的破產與正義法則的追尋〉，《國文天地》第2卷第11期（1987），頁80-83。

<sup>43</sup> 《易》第2章，頁44；Change, p. 21.

<sup>44</sup> 《易》裡未指明胡適該文出處，但應指胡適1910年代《中國哲學史》與其相關論述的「老先孔後」史觀。參歐陽哲生：〈胡適與道家〉，《中國哲學史》第4期（1997），頁102-114；趙稀方：〈論老子思想對胡適的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5），頁94-100。

從而視後者為典範，進而確立其遺民主體的延續性。此外，老子相對入世儒者而主張守陰尚弱的隱微避世觀，更讓主角將老子奉為與孔教禮法大傳統對照之下，既代表著中國民間小傳統與民族心理寄託的生存智慧，更是具有女性化（feminine）特質的陰性文明先哲：<sup>45</sup>

陰陽不歇的衝突中，老子顯然相信陰是女性，多數時候弱能勝強。……民族心理上多的是老子而不是孔子。歷史上天災人禍頻仍，老子始終是唯一的支柱。  
（“In the eternal struggle between *yin* and *yang* he apparently believed *yin* the female and passive would win most of the time……There was more of him than Confucius in our mentality. He was our only prop through all the disasters in history.”）<sup>46</sup>

承上來論，張愛玲在《雷》、《易》裡特別安插進主角對伯夷叔齊與老子學說的雙重援引脈絡，體現了她有意將主角的成長身世，鑲嵌進儒、道學說為支撐的中國傳統文化觀。概言之，如果說伯夷叔齊的典故，象徵了儒教遺產在新時代下面臨興廢存亡的價值危機；主角就老子學說強調的陰性面向，則反映張愛玲有意將老子的尚弱說再現為視陰為女的性別觀，由此鋪寫主角成長過程中對自身女性身份的探索、及其對女性在傳統社會體制下性別處境的深切觀察。

具體來看，以老子的尚弱說來暗喻主角的性別啟蒙過程，可見張愛玲在《雷》與《易》裡，便以不同程度的描寫篇幅，敘及主角從童年到青春期獲得的女性經驗與性別認知。如在《雷》裡，張描寫了幼年主角對於留洋母親之柔美女性形象的想往（第四章），卻也著墨主角家中褊姆頻繁引述的民間俗諺，帶出傳統社會裡的重男輕女觀（第三章）；或寫主角從姑、母閒談中，得知儒教宗法制度對女性貞潔／節的重視（第十、十二章）。而在《易》裡，張愛玲更描寫主角進入青春期後對周遭兩性情事的好奇，並於多處突顯主角母親對女兒的教導中深植的傳統性別階序觀。此如《易》第三章寫到主角母親敦斥女兒言行舉止所投射的性禁忌（第三章），又或是述及主角的婚嫁想像中對夫妻倫常大道的畏然惶恐（第十八章），或描寫主角在戰事下對於失貞的恐懼（第十四章），或由主角與母親的決裂事件，呈顯出傳統貞操觀與孝道觀所引發人倫關係的桎梏與世代衝突（第九章）。

從上可見，張愛玲在《雷》、《易》裡既以老子的尚弱說來帶出主角對自我女性身份的覺察；但是，其亦將老子貴柔守雌的哲學，勾連起傳統宗法社會裡講求貞潔婦德與男尊女卑的文化生態，使《雷》、《易》裡的少女成長故事，隱含了作者對傳統文化積習的間接批判。此如研究者指出的，張愛玲在《易》開頭引入的老子尚弱說，似表現其藉此彰顯道家

<sup>45</sup> 張榮華：〈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傳統關係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7），頁73-82。

<sup>46</sup> 《易》第2章，頁44；Change, p. 22.

的「陰性原則教人守雌通變」，但其在小說裡不吝描寫女性角色受制於「(男性社會裡)約定俗成的禮教」與帶來的「傷害」，<sup>47</sup>反而弔詭地突顯了傳統宗法社會體制裡，女性在性別養成道路上所承受與深受「不平等分配」的「受弱」困境。<sup>48</sup>

此外，《易》不吝於鋪寫主角在成長過程中對兩性現象的好奇，也反映張愛玲亦將老子的守陰思想結合起《易經》的陰陽概念，<sup>49</sup>使「易」指涉變易相生的天道哲學，在小說裡既象徵了主角遷延流轉的成長史，但「易」所涵蓋陰陽乾坤的兩性和合觀，亦在主角的性別認知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啟蒙角色。如《易》裡描寫到主角於戰事下見到同儕們隨青春期發展的生理性徵與曖昧情事，張便將其勾連起「混沌初開，男與女的力量，陰與陽的力量」(“The male and female force, *yin* and *ya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sup>50</sup>此具《易經》意味的陰陽兩性之道；或是描寫主角於戰火砲劫下的舊書堆欲尋出《易經》，從中突顯《易經》在主角看來既是五經中最神秘難解的卜筮之書，更是先哲闡述生命之源與民族性學的代表之著：

這是一本哲學書，論陰陽、明暗、男女，彼此間的消長興衰，……五經裏屬《易經》最幽秘玄奧，學校也不教，因為晦澀難懂，(筆者按：更重要的是，)也因為提到性。(“It was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forces of *yang* and *yin*, light and darkness, male and females, how they wax and wane, grow and erode,……It was the most esoteric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not taught in the schoolroom because of its obscurity and more important, its mention of sex.”)<sup>51</sup>

事實上，《易》此幕發現中國古代經典的橋段，除了突顯「易」的兩性陰陽意象為貫穿主角身、心成長的啟蒙線索，也標示了主角在戰事下對儒、道教義的檢視與重新思考。如就儒家治典，張便敘及主角在戰事洗禮下，體認到儒教禮法的中庸之道對於形塑民族道德意識與行為軌範(“Beauty that you were used to had a sense of rightness that for most people passed for virtue.”)的必要性。但對主角來說，儒家主張秩序之美的王道觀，在亂世下顯然已是「遙不可及」(“far away”)，且儒教體制對於女性造成的壓迫(“Oppression……always falling heavier on women.”)<sup>52</sup>反而突顯傳統中國女性被壓迫成習的弱勢美學，或以呼應老子的「弱

<sup>47</sup>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同註11，頁83。

<sup>48</sup> 張小虹：〈誰怕弱理論〉，《張愛玲的假髮》(臺北：聯經，2020)，頁378。

<sup>49</sup> 陰陽性學觀之概述，參〔荷〕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著，吳岳添譯：《中國艷情——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臺北：風雲時代，1994)，頁61-79。

<sup>50</sup> 《易》第18章，頁300；Change, p. 239.

<sup>51</sup> 《易》第18章，頁288；Change, p. 230.

<sup>52</sup> 《易》第18章，頁289、290；Change, p. 230, 231.

能勝強」說，因而彰顯出道家思想作為中華民族潛默奉守的幽深哲理。而張愛玲此將老子的守陰思想連繫起主角的性別啟蒙過程與民族信仰哲學，便代表性地反映在其於《易》最後敘及主角憑其女性巧慧自戰場逃脫的結局——當中，主角的劫後餘生除了代表女性睿智的小我求生，並可說在更大層面上，象徵了民族大我在戰事下隱忍求存的未來願景：

道家面對災禍的陰柔態度，損之為益，……這種懷疑論與退讓說不定幫中國積攢了大量的活力。（“Taoism’s feminine way of meeting calamity,……It might be that this skepticism and holding back had still saved China a great store of untapped energy.”）<sup>53</sup>

### 三、《世界作家》為載體：

#### 張愛玲 1960 年代〈自介〉的譯寫自述與域外衍播

通過上節論述，可見張愛玲在《雷》與《易》裡以援引儒、道學說與意象，將小說裡的少女成長故事，鑲嵌進具中國文化指涉的象徵意涵。概言之，張愛玲在《雷》裡以引用儒家格言，將主角遭民家世勾連予儒學思想及其文化體制，並以描寫主角家世的沒落，喻寫儒教學說在新時代的式微。與此同時，張在《易》裡則引入老子的尚弱說與《易經》的陰陽乾坤概念，既以此詮釋主角的性別啟蒙，並從中彰顯道家以柔克剛和禍福相倚的民族哲學。事實上，張愛玲此種納入傳統文化概念，來彰顯小說所述為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敘事表現，亦可見其與《雷》、《易》寫作同期的英文長篇小說 *Pink Tears*（後易名 *The Rough of the North*，中譯為《怨女》）。<sup>54</sup>如相較《怨女》的舊作底本〈金鎖記〉以中篇形制，精鍊地再現主角交織著愛與欲而張狂的徹底性人格，張在《怨女》則以長篇篇幅，以描寫主角置身於傳統大家族而依違在對宗法體制的順服與個人的掙扎欲動，彷彿向讀者再現歷代中國女性在禮教規制下「深受委屈」<sup>55</sup>的「怨女」共相。

然而，或許因為張愛玲在《雷》、《易》與《怨女》裡有意地引入中國傳統意象與學說來增添文化訊息，此三部小說完成後，反而遭到英語讀者因文化背景的差異與認知侷限而產生接收障礙。如 1960 年代中期，張陸續將《雷》、《易》與《怨女》投稿至美方出版社，

<sup>53</sup> 《易》第 18 章，頁 309；Change, p. 245.

<sup>54</sup> 據張致友信中所陳，《怨女》的撰寫約著手於 1956 年，《雷》、《易》為 1957 年，三者完成時間約落在 1964 到 1965 年左右。張愛玲、宋淇、宋勵文美著，宋以朗編：《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1955-1979》，同註 4，頁 38、122、129、131。

<sup>55</sup> 郭玉雯：〈〈金鎖記〉與《怨女》比較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頁 163。

卻遭致對方不甚肯定的回覆。此可見 1964 年 10 月，張致友信中提到申請《怨女》出版，但眾退稿信中最「憤激」的一封為指「(筆者按：小說裡)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甚而批評表示：「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 squalid (筆者按：指汙濁的、道德敗壞的)。」<sup>56</sup>從上可見，出版商對《怨女》的閱後觀點，與其說針對的為純粹的文學問題，倒無甯說是以西方讀者的角度自居與文學商業市場的考量，透露了其對中國、或是東方，自有一套既定的印象框架與文化認知成見。<sup>57</sup>如出版方舉日本小說的「微妙」，便暗示其認可的東方文學應具備引人深思的情調，而此情調便是作品應蘊含具高妙意境的傳統哲思與「微妙」的文化美學深度。因此，出版方指《怨女》裡人物角色形象的道德敗壞，顯然與其以「微妙」來指東方文學應具備審美性質的道德人文主義，有著相當落差。

事實上，出版商的負面評語，可以說突顯了張愛玲以英文來處理中國題材的寫作表現，並未符合多數英美讀者對傳統中國或東方的美化想像。細言之，從上節論述可見，張愛玲在《雷》、《易》裡以儒、道意象貫穿為主要敘事線索，但是其挪用的儒、道概念，實際上並非來自精整的知識體系或訴求於哲理深義的傳遞，卻是突顯了其藉由概觀地引入儒、道概念，旨在將筆下人物的性格與意識，再現為深受民族傳統思維影響而引發的內在衝突與矛盾情結。或許正是因為張在《雷》、《易》裡以片面的文化意象與逆向操作來寫出中國文化情境裡非「微妙」的現實面向，使美方出版社難以理解其意；但是對張愛玲來說，這毋寧說是她有意逸離出西方讀者閱讀期待視野的寫作表現。如 1964 年 11 月，張在致友信中便表示，她的英文作品為有意打破異文讀者對東方的文化成／偏見：「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sup>58</sup>而隔年 2 月，獲知《怨女》被日本文學研究者批評小說人物形象過於負面，張也認為該學者「也像一般『東方學家』一樣」，「把東方理想化」了。<sup>59</sup>

承上來論，儘管美方出版社的負面回應，或反映了張在《雷》、《易》寄存的文化隱喻有未為周全與不夠深化之處，但正是由於張在創作之初即抱有不欲美化中國題材的寫作意識，因此出版社的回復，反而激發她對跨語寫作涉及跨語境的文化認知差異，提出檢視與省思。即在張看來，跨語寫作除了涉及語際轉換的語言技術能力，更關鍵的或許還在於此類寫作涉及的文化題材，如何被異文讀者接收、並接受的跨語境文化傳譯課題。而就此課

<sup>56</sup> 張 1964 年 10 月 16 日信。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頁 22。

<sup>57</sup> 本文論述張的英文作品與英文讀者市場的關係，除了將後者稱之「英美讀者」(指張寓美後的目標讀者市場，即美國與英國為主的英文讀者)，或稱作「西方讀者」(以根據張〈自介〉裡指稱的西方讀者)與「域外讀者」(為更大面向上指包含了英美、西方與非使用中文語言的域外讀者)。此三詞基本上為本文為互用，唯視論述文脈，或採取其一稱呼。

<sup>58</sup> 張 1964 年 11 月 21 日信。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同註 56，頁 26。

<sup>59</sup> 張 1965 年 2 月 7 日信。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1955-1979》，同註 4，頁 124。

題，1965 年底，一份來自美國威爾遜出版公司（H. W. Wilson Company）<sup>60</sup>的邀稿函，為張愛玲迎來了說明與解釋的契機。事實上，此份邀稿函為威爾遜公司為出版世界作家名錄叢書，故邀請作為選錄作家之一的張愛玲撰寫自介文章（以下簡稱〈自介〉）<sup>61</sup>。然而，對於此邀稿機會，事後張愛玲則表明，她這篇〈自介〉實為藉此說彼，即她有意針對自己當時「兩部」「賣不出」的小說（即《雷》、《易》與《怨女》）<sup>62</sup>，「通篇都在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sup>63</sup>。

承上來論，張愛玲所謂「語言障礙外的障礙」，強調的便是她認為跨語寫作除「語言障礙」，更牽涉跨語境的文化認知障礙。因此，為聚焦闡述對這一課題的看法，張在這篇〈自介〉裡，便以約八百字的英文篇幅，既從中簡述自我成長身世，更針對赴美後在寫作上遭遇文化認知的差異，促使她從文化剖析的角度，再到自陳創作觀，全文以圍繞跨語寫作與其涵攝文化譯寫的課題，提出了精闢的剖析。如文章開首處，張愛玲簡陳其早年受傳統中式到西化教育的受教歷程，後到踏入滬上文壇，再到戰後因政體變革而離開中國等生平概觀。當中，張愛玲尤將父母離異的個人家世連結至民初中國的時代語境，著意指出家庭制度的變革代表了近代中國在政經體制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中國家庭制度當時正在崩盤，一般而言僅靠經濟因素而苟且維繫。」（“The Chinese family system was falling apart, generally held together only by economic factors.”）<sup>64</sup>

延續第一段所提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對自我身世的影響，在文章第二段，張愛玲進入申說重心，即針對她赴美後的跨語寫作所遭到出版商的否定，就對方觀點涉及的文化認知偏見，提出循序漸進的回應。如該段起始，張簡述了其 1952 年以來的寫作動向，包括赴港之初撰寫《秧歌》，同時從事翻譯與劇本寫作，再來則是 1955 到 1965 年的十年居美期間，專心「忙於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即《怨女》與《雷》、《易》）。而對於這兩部花費她約十年心血的寫作成果，張愛玲表示，這些作品涉及的民初中國題材卻遭到美國出版商帶有文化成見的批評，指出版商認為小說裡的人物為「令人不快的」（“unpleasant”）、「連窮人也不討喜」，甚至對方更批評張在小說裡將「舊中國」描寫得「如此糟糕」，<sup>65</sup>反而會令人認同舊中國被共黨推翻的合理性。

針對出版商此閱後觀點，張愛玲接下則反駁表示，對方觀點可以說反映了在認知中國的觀點上流於簡化的二元論，即此二元論為視舊中國與共產中國為傳統儒教智識與普羅政

<sup>60</sup> 該公司成立於 1898 年紐約，其出版品多為各學科領域之索引名錄與資料庫，後於 2011 年併入 EBSCO 公司。參其官方網站：<https://www.hwwilsoninprint.com/index.php>（訪問日期：2021 年 3 月 26 日）。

<sup>61</sup> 本文就〈自介〉的引述，主要來自高全之的中譯版，然部份為筆者自譯。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張愛玲學》（臺北：麥田，2011），頁 408-412。

<sup>62</sup> 宋以朗：〈《雷峰塔》／《易經》引言〉，張愛玲著，趙丕慧譯，《雷峰塔》，同註 3，頁 9。

<sup>63</sup> 張 1965 年 12 月 31 日信。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同註 56，頁 36。

<sup>64</sup> 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同註 61，頁 408-411。

<sup>65</sup> 同前註，頁 409-411。

權為絕對的舊、新與善、惡對立，卻忽略了近代中國政體變革後那深層的民族心理背景與社會文化脈絡。如她闡釋到，共產體制前的中國確實存在著「腐壞與空虛」(“decay and vacuum”)，而此腐壞趨向導致人們產生「信仰的需要」(“a need to believe in something”)，且此需求已然無法從內耗(“ingrown”)的傳統儒教學說找到出路，故「物質虛無主義」(“materialistic nihilism”)成為時興風潮，進而推生共產主義的崛起。再者，在張看來，共產主義雖為外來思潮，但該主義強調的集體特性，仍可視為中國傳統血親家族制度的擴大版(“replacing the family with the larger blood kin”)，甚至可說是近代「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另類變相。

細部來看，張愛玲在〈自介〉第二段的申論內容，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其一、便是她溯及了近代中國在歷史沿革與價值體系變革的複雜情況，指出傳統儒學在 20 世紀初的破產，既有其內部消耗，以及外部上淪為形式化的問題，使儒教學說不再是社會價值信仰的主要憑藉。第二、在張看來，看似取代傳統儒教而為近現代新興思潮的共產主義亦非全然與中國傳統思維相悖，而是該主義或延續了中國傳統觀念裡對民族血緣的重視，甚至與近代時興的國族主義思想也有著密切關係。第三、張則是由儒家傳統體制到無產普羅政權的過渡流變，進以針對共和時期的中國，申說在其看來，共和時期乃是理解舊中國到共產中國之文化轉型的關鍵階段(“what concerns me most is the few decades in between”)。<sup>67</sup>如她表示，共和時期帶來的「毀壞」(“dilapidation”，應指舊有政體傾覆與社會體制的解體)、「狂暴張力」(“last furies”，喻指革命動盪與帶動社會風氣之騰興)、「混亂」(“chaos”)與「不穩定的個人主義」(“uneasy individualism”)，使共和時代堪為中國歷史上轉型最劇的分水嶺，且該時期在外來風氣大開下對自由的觸及與嘗試，並可說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導源與潛在推力(“any changes in the future are likely to have germinated from the brief taste of freedom”)。<sup>68</sup>

延續著視共和時期為近世中國文化轉型的歷史關鍵期，張愛玲在〈自介〉末段，再以回應文章開首提到民初家庭制度的崩解，進一步論及儒教體制為共和時期中國在風頭浪尖上的重點批判對象。如她表示，「中國比東南亞、印度及非洲更早領略到家庭制度為政府腐敗的根源」，直指傳統儒教人倫制度在近世革命的風起雲湧下，掀起其驚濤駭浪的崩解，進而激化出新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之批判性寫作的崛起。如張申說到，新文學極力挖掘儒教制度的罪惡，不僅攻擊「吃人禮教」，激進至「鞭撻死馬」的程度(“to the extent of flogging a dead horse”)，並且傳統的儒教道德命題也在新文學者備受「國恥」(“national

<sup>66</sup> 同前註。

<sup>67</sup> 張愛玲〈自白〉裡指的共和時期應為西元 1911 年民國肇建以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點的 1910 至 1930 年代的戰前時段區間。就此時段，本文沿張所謂，稱以共和時期，或簡稱為共和中國。

<sup>68</sup> 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同註 61，頁 409-412。

humiliations”) 陰影的自省角度下，被予以尖刻的寫實批判與心理學式的翻案重估。然而，就新文學在 20 世紀早期中國引發的社會盪漾與文學風潮，張愛玲則指出，新文學這種立意批判儒教傳統的時代精神，卻顯然未被西方世界接收與了解，從而導致西方對中國傳統儒教文化，仍舊抱持「寬容，甚至尊敬的態度，不予深究這制度內的痛苦」(“the trend is for the West to be tolerant, even reverential, without a closer look at the pain inside the system.”)。就此，張愛玲則自表，相較於西方世界對 20 世紀早期中國在文化轉型的陌生，新文學不僅是她寫作上重要的「心理背景」(“psychological background”)，她並自認赴美後在寫作上遭遇的「跨國理解障礙」<sup>69</sup>，其實就是根源自西方對於傳統儒教中國抱持美化的心態，卻又未認知到共和時期中國對於儒教體制提出的自我批判精神，從而導致雙方就近代中國的文化認知，產生無法銜接的落差。

整體來說，張愛玲在〈自介〉裡的文化申論多於文學觀陳述，且其表述簡明精要，使其部份觀點，或有待更深入與詳細的釐清。然而，作為一篇面向英文讀者來闡述近代中國之社會變革、文化轉型與自身創作觀的文章，張的這篇〈自介〉既是其赴美後重要的寫作聲明，該文也對於理解張寫作《雷》、《易》的立論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首先，張在〈自介〉裡強調傳統家庭制度的崩解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最重大現象，可說正對應著她在《雷》裡以塔為象徵來描寫主角的遺民家世在新時代的沒落。再者，張在〈自介〉裡特別針對儒教價值系統在 20 世紀初面臨的內、外危機，與其成為新文學創作者的攻訐與批判對象，也反映她在《雷》裡以援引儒家訓言，由此反襯小說主角對儒教學說遺產的質疑與叩問。此外，張愛玲在《雷》、《易》裡描寫主角成長路上見聞家族人事未能合乎儒教禮法的道德缺失，及其著墨主角與女性親友在互動間所體認到傳統宗法制度對於女性的壓迫，亦可說回應了她在〈自介〉裡強調共和時期中國對於儒教傳統積習提出的檢討聲浪。由此可見，張愛玲在《雷》、《易》裡雖引用儒、道學說來增加小說裡的中國文化訊息，但其敘事意旨並非在於正面渲染傳統觀念的意涵深度，卻是再現了這些文化遺產作為小說主角成長路上的羈絆，以及這些傳統因襲思維需被檢視的流弊與價值意義的不確定性。而對張來說，她這種非典型的自我民族批判敘事，不僅來自她借鑒自五四新文學的寫作精神，更展現了其有意將自傳性題材的書寫衍繹為文化譯寫，而其寫作目標，便是為讓西方讀者理解到 20 世紀初的中國所夾縫在傳統觀念與現代思潮而舉步維艱、尷尬兩難的真實處境。

承上來說，〈自介〉一文不僅對於理解《雷》、《易》有著重要的意義，該文展現張愛玲以中國為題材之跨語寫作所寄存的文化傳譯意識，也透過〈自介〉收錄進的《世界作家》叢書為載體，讓張的文化譯寫實踐被置於「世界」文學的知識版圖上，豎立起其定位與價值。事實上，《世界作家》為美國威爾遜出版公司於 20 世紀中葉後推出的參考書系，其前

<sup>69</sup> 同前註，頁 410、412。



身可溯及早期的 *The Authors Series* (筆者自譯：《作家系列》) 人文學科叢書，<sup>70</sup>以及 1942 年以二十世紀歐美作家為選錄範圍的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ture* (筆者自譯：《20 世紀作家：現代文學作家名錄》)。<sup>71</sup>而在這些作家名錄系列的基礎上，威爾遜公司自 1950 年代始，再以補錄形式，擴展推出以 *World Authors* (《世界作家》) 為題的作家名錄叢書集，至 1980 年代共計出版有「1900-1950」、「1950-1970」與「1970-1975」等卷冊，<sup>72</sup>而收錄進張愛玲的卷冊，即為《世界作家：1950-1970》該冊。

值得注意的是，威爾遜公司在 20 世紀中葉後推出的《世界作家》叢書，不僅較 1940 年代的《20 世紀作家：現代文學作家名錄》在容納作家數目上更多，其特點更在以「世界作家」為主題，展現了其如代理者 (agent)<sup>73</sup>的角色，以透過叢書的編制，從而呼應美國官方在冷戰期間提倡跨種族融合的政治—文化勢力收編幅度，由此勾勒出冷戰美方視野下的「世界」文學版圖。換言之，雖美其名為世界作家叢書，但該書系的「世界」概念實以該詞字面上指涉跨國域的世界範圍，突出美國在冷戰期間以借重自由的、跨國的與全球化的為訴求名目，來推行其以反共為旨的「世界」冷戰文化政策。<sup>74</sup>因此，《世界作家》裡選錄的「世界」作家雖看似納進歐美以外的他國作家，但這些選錄作家則是展現其在國籍來源或文學創作特點上，具備著與冷戰美國在現實交涉與政治取向的密切關係。此外，作為高等教育研究叢書的人文學科參考書系，《世界作家》的編制方式亦突顯其以選錄作家的簡介自傳，合併以編者對作家作品的學術評見，展現該書作為再現冷戰美方視野下的「世界」作家知識話語場。

如就收錄張愛玲〈自介〉的《世界作家：1950-1970》該卷冊以觀，被納入書中的亞洲作家與其作品，便在不同層面上，反映冷戰美方在「世界」概念主導下所側重作家書寫中的民族文化基調與具有「世界」性的現代向度。如書中選錄的日本作家，便被強調其創作內涵根植的大和民族性與兼備廣闊的世界格局。如芥川龍之介 (1892-1927) 被指出其深厚的漢文根柢與西方文學素養，又其古典新編文體既顯示大和知性傳統，亦以對人性道德辯證的挖掘，展現其創作蘊涵覺醒世代 (“disenchanted age”) 的個人性。<sup>75</sup>至於安部公房

<sup>70</sup> 如該書系底下包括有：*American Authors: 1600-1900*, *British Authors Before 1800*, *The Junior Book of Authors* 等子系列。

<sup>71</sup> 該書後有增補版，如 1955 年的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First Supplement*。

<sup>72</sup> 此三卷冊各題以 *World Authors: 1900-1950* (《世界作家：1900-1950》)、*World Authors: 1950-1970* (《世界作家：1950-1970》) 與 *World Authors: 1970-1975* (《世界作家：1970-1975》)，三部副標題皆冠以“A Companion Volume to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 (《20 世紀作家補錄》)。

<sup>73</sup> 轉引自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13)，頁 125。此詞指「處於譯者與翻譯使用者之中間位置」的人事或機構，本文借該詞以指威爾遜公司具有銜接美國官方意識形態與社會讀者群的橋樑位置。

<sup>74</sup> [英]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Y: The New Press, 2013).

<sup>75</sup> [美] John Wakeman ed., *World Authors: 1950-1970* (NY: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75), pp. 21-22.

(1924-1993)亦被突顯其作品反映的歷史創傷與後現代實驗書寫風采。如編者強調，安部跨界的文學書寫深刻觸及了身份認同與存在主義等思辨，並展現對戰後世代就世界重組、人類社會本質(“the whole nature of human society”)與普世真理(“universal implications”)的精神探索。<sup>76</sup>

至於具有華人背景的作家，《世界作家：1950-1970》也以選錄具有跨國經歷，並擅長中、英跨語寫作的創作者，反映美方看重這些作家在生平與寫作特點上觸及的東、西跨文化交流與「世界」性意義。如書中選錄的作家韓素音，其歐亞混血身世不僅象徵著近世中國走向世界的拓衍足跡；<sup>77</sup>又韓氏被強調其《瑰寶》一作的跨國戀題材，<sup>78</sup>也呼應著冷戰美國以訴諸情感的(affectual)、感性的(sentimental)與人性的(humanity)來倡導東、西方戰後緊密友好的交流關係。<sup>79</sup>而華裔作家黎錦揚(1915-2018)在書中則被彰顯其青年時期對中國邊疆民風文化的親身經歷，又其善於鋪寫華人百年移民史所展現的世界觀亦備受肯定。如編者按語便強調黎氏知名《花鼓歌》(*The Flower Drum Song*, 1957)一作著墨美國華裔社群的世代衝突喜劇敘事，突出黎氏筆下所述之觀照一世紀以來，華人從遷徙離散、移民到定居美國此「大融爐」而呼應戰後美國標舉「以美為家」(*America as the homeland*)的政治願景。<sup>80</sup>

而相較於韓素音的歐亞身世與黎錦揚的華裔作家身份，《世界作家：1950-1970》裡的張愛玲形象，亦被彰顯其作品具有解剖中國文化的意蘊深度、及其寫作視野所具廣向的世界性價值。事實上，《世界作家》對張愛玲的編者按語，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夏志清(1921-2013)在其1961年著名論著(即*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裡讚賞張氏寫作所透察中國人情世故的觀點。而根據夏氏評見，《世界作家》的編者按語則以濃縮的方式，舉列評述張氏作品對中國文化的如實描寫與挖掘深度。如就《秧歌》一作，《世界作家》便指該書不僅是寫共黨統治下的民食危機，而是展現張愛玲鞭辟入裡地呈現了中國社會在衰頹最後階段裡，由傳統流弊造成的癱瘓與人心腐化(“They present a society in the last stages of decay,

<sup>76</sup> 同前註，pp. 1-2.

<sup>77</sup> [波]Teresa Kowalska, “Tea, Ivory and Ebony: Tracing Colonial Threads in the Inseparable Life and Literature of Han Suy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0 (2000): pp. 21-32.

<sup>78</sup> 韓素音(本名周光瑚，亦名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 1916-2012)，成名作為1952年出版的自傳性小說*A Many-Splendored Thing*(後中譯為《瑰寶》或《愛情多美好》)。

<sup>79</sup> [美]Christina Klein, “Sentimental Education: Creating a Global Imaginary of Integratio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9-60.

<sup>80</sup> 《花鼓歌》在美推出後獲得佳評，後改編為百老匯與電影等跨媒介版本。參[韓]Chang-Hee Kim, “Asian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of American Empire in *Flower Drum Song*”, *Cultural Critique* 85 (Fall, 2013): pp. 1-37. [加]James Deaville, “The Many Lives of *Flower Drum Song* (1957-2002): Negotiat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in Print, on Stage and on Scre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Music, Representation and Reception*, eds. Hon-Lun Yang and Michael Saffl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pp. 119-136.

paralyzed by traditions and conventions that corrupt the men and stifle the women”); 至於張的歷來作品也以具私領域閨閣寫實 (“intimate boudoir realism”) 的向度, 對中國社會與道德傳統 (“social and moral concern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提出具心理深度 (“psychological sophistication”) 的拷問; 又〈金鎖記〉與其衍生的長篇英文小說 *Pink Tears*, 亦體現張的寫作主題關注在傳統家庭制度對個人造成無法逃脫的壓迫與禁錮 (“constant theme is the crushing of the individual by the family until he no longer even wants to escape”)。至於對張愛玲的總體評價, 《世界作家》並盡顯其強調「世界」觀的詮釋視角, 論指張秉持以人為本的角度而極盡所能地描寫垂死的社會系統下人類所受身、心浩劫 (“remains a richly evocative picture of a dying social system and the havoc it wreaks upon human beings”), 讚賞張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以對人性書寫的深度, 不僅超越了民族與時空的限制, 並具有世界性的高度與普世啟示 (“Her picture of prerevolutionary China, however, achieve at their best a universality that transcends their time and place.”)<sup>81</sup>

概觀之, 僅管《世界作家》對張愛玲的編者評語為根據夏志清的論點, 但是作為以叢書為載體來形構「世界」作家名錄的知識話語場, 《世界作家》對於彰顯張愛玲的中國題材寫作在「世界」上的定位, 仍有著不可小覷的意義。一方面, 通過《世界作家》的詮釋, 張愛玲作品成為了冷戰美方將其納入世界文學體系來觀照、並認知近現代中國的代表文學入口, 進而擴展了張愛玲在 1950 年代主要被塑造的反共作家／譯家形象。<sup>82</sup>另一方面, 對張愛玲而言, 憑藉《世界作家》為媒介, 其在〈自介〉力陳自己的跨語寫作以非美化之筆來揭示 20 世紀早期中國社會的文化傳譯立意, 也可說獲得了向外發聲的機會。然而, 如張愛玲無法預料的是, 《世界作家: 1950-1970》直至 1975 年才出版, 此因而使得撰寫完成於 1965 年的〈自介〉, 以及張愛玲欲藉此文來間接推銷自己的《雷》、《易》, 未能立即收到實質的反響與回饋。<sup>83</sup>但通過本文爬梳, 可見張愛玲與其〈自介〉在《世界作家》的「名留青史」, 不僅顯示張在 1960 年代已躋身美方視野下的「世界」作家之列,<sup>84</sup>亦足以帶出張愛玲在《雷》、《易》的文化譯寫實踐走向「世界」的可能與意義貢獻。

## 四、結語

<sup>81</sup> [美] John Wakeman ed., *World Authors: 1950-1970*, pp. 298-299.

<sup>82</sup> 單德興:〈冷戰·離散·文人:《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8 期(2020), 頁 1-80。

<sup>83</sup> 參張 1966 年 3 月 31 日信:「上次我提到的“Mid-Century Authors”要到 1968 年才出版, 想藉它宣傳幫我賣小說, 也不必想了。」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同註 56, 頁 41。

<sup>84</sup> 從「世界文學」理論探及張愛玲於當代的文學定位, 可參論者綜述「張學」帶動的上海學與張氏作品的跨媒體改編現象, 並討論張氏作品拜英美學界研究之賜的「世界化成」(worlding)。Carole Hang Fung Hoyan, “Include Me Out: Reading Eileen Chang as a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Ex-position* 41 (June. 2019): pp. 7-32.

早在青年時期，張愛玲便有以中、英雙語來譯寫中國題材的創作願景。如論者指出的，張愛玲早年自述的「林語堂夢」便透露了其欲藉雙語才華將中國翻譯予域外讀者的壯志。<sup>85</sup>然而，張氏後來的中、英雙語自譯、或是英文小說諸作，卻反映了她與林語堂（1895-1976）在中、英跨語寫作上的諸多對照。概言之，除了因寫作時代語境、語言知識背景與文化資本等外緣條件的差異，導致張與林在英美文學市場的接收落差；<sup>86</sup>相較林語堂以西方讀者為本位的譯寫策略與對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理念化演繹，<sup>87</sup>張愛玲的英文書寫則以保留異質語言元素與對中國題材採取直譯與非美化的再現，<sup>88</sup>終讓她的英文寫作不如林氏揚名海外。但是，張從早年的「林語堂夢」到走出具自我格局的雙語作家道路，卻也反映其中、英跨語書寫在處理文化翻譯課題的複雜向度。

本文因此由張愛玲的英文自傳性長篇小說《雷》、《易》為對象，主在探討張愛玲對《雷》、《易》寫作涉及的跨語境文化傳譯課題。本文指出，張在《雷》與《易》裡援引儒、道概念，既將小說主角遺民家世的沒落，喻寫為傳統儒教體制在民初中國的衰頹，其並以對道家學說的性別化詮釋與結合《易經》陰陽觀，鋪寫主角的性別啟蒙過程與民族生存哲學的互通性。而藉由引入儒、道意象，張在《雷》、《易》裡既突出其筆下故事根植的中國文化土壤背景，卻也對傳統文化積習提出了檢視與省思。而後，本文由張愛玲寫於1960年代中期的〈自介〉，追蹤張寫作《雷》、《易》的立論背景，實有其借鑑新文學的民族批判敘事來彌縫西方讀者對近現代中國之文化偏／成見的寫作動機，並映顯在她於《雷》、《易》以非美化的揭示之筆來譯寫中國的表現。最後，本文觀照收錄〈自介〉的《世界作家》，分析該書反映冷戰美方視野對張氏作品的「世界」化詮釋，使張躋身世界作家之餘，並勾連出《雷》、《易》在張愛玲跨語譯寫實踐中的特殊意義。

整體來說，相較於既有研究多從張愛玲自傳書寫角度來探討《雷》、《易》，或是集中於分析張在《雷》、《易》的英文寫作技術，本文則爬梳張愛玲在該作裡引入儒、道意象的譯寫表現，並納入其於〈自介〉陳述的跨語寫作觀與《世界作家》叢書載體，廣觀地追蹤了《雷》、《易》的文化傳譯向度。然而受限篇幅，除了本文所論《雷》、《易》的儒、道意象，張愛玲在該作裡引用的中國文化概念，或有待更完整的耙梳；並且，張在〈自介〉裡針對共和時期中國提出的文化闡論，或可勾連其相關作品以共和中國為題材的書寫表現和寄寓的文化傳譯線索（如：《The Young Marshal》《少帥》、〈五四遺事〉等）。故在本文的探討成果上，以上課題將待筆者日後專文處理，期以更全面地挖掘出張愛玲文化譯寫的可觀探討面

<sup>85</sup> 蔡登山：〈完不了的「林語堂夢」〉，《傳奇未完——張愛玲》（臺北：天下遠見，2003），頁133-148。

<sup>86</sup> 楊雪：《多元調和：張愛玲翻譯作品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頁150-155。

<sup>87</sup> 馮志強：《中國智慧的跨文化傳播——林語堂英文著譯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1），頁44-46、153-157。

<sup>88</sup> 余彬：〈張愛玲與林語堂〉，《新文學史料》第2期（2009），頁148。蔣美紅：〈後殖民視域下張愛玲與林語堂的跨文化寫作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30卷第1期（2019），頁55-56。

向。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 Chang, Eileen, *The Book of Cha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 *The Fall of the Pagod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Hoyan, Carole Hang Fung, “Include Me Out: Reading Eileen Chang as a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Ex-position* 41(2019).
- 王德威：〈此怨綿綿無絕期——從〈金鎖記〉到《怨女》〉，《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1998年。
- ：〈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2007年。
- 王德威著，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和“衍生”的美學〉，《現代中文學刊》第6期，2010年。
- 余彬：〈張愛玲與林語堂〉，《新文學史料》第2期，2009年。
- 宋以朗：〈《小團圓》前言〉，收於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2010年。
- 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2010年。
- 李歐梵：〈張愛玲的英文問題——張愛玲英文作品中融入中國元素的嘗試〉，《現代中文學刊》總第9期，2010年。
- 林幸謙：〈張愛玲的女性敘述及其反父權策略的書寫〉，《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臺北：洪葉文化，2000年。
- 林聰舜：〈伯夷叔齊怨邪悲邪？：天道的破產與正義法則的追尋〉，《國文天地》第2卷第11期，1987年。
- 姚玳玫：〈冷戰格局中的個人安妥：張愛玲後期的文學書寫〉，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2018年。
- ：〈沒有足夠的愛去克服兩個世界的鴻溝——從張愛玲的母女書寫看“五四”之後個人主義女性的倫理困境〉，收於楊聯芬主編，《性別與中國文化現代轉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
- 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2013年。
- 高全之：〈《雷峰塔》與《易經》的遺民態度〉，《現代中國學刊》總第26期，2013年。
- ：〈張愛玲的英文自白〉，《張愛玲學》，臺北：麥田，2011年。
- 張小虹：〈誰怕弱理論〉，《張愛玲的假髮》，臺北：聯經，2020年。

-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I，1980-1995》，臺北：皇冠，2020年。
-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I，1955-1979》，臺北：皇冠，2020年。
- 張愛玲著，趙丕慧譯：《易經》，臺北：皇冠，2010年。
- ：《雷峰塔》，臺北：皇冠，2020年。
- 張榮華：〈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傳統關係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7年。
- 張龍云：〈世界文學與中國經驗：張愛玲英文小說價值論〉，《江漢論壇》第7期，2021年。
- 許閔淳：《變異之外——論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中的「母女」關係》，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8年。
- 郭玉雯：〈〈金鎖記〉與《怨女》比較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
- 郭強生：〈張愛玲真的有「創作」英文小說嗎？〉，載《聯合文學》期311，2010年9月，轉引自「郭強生的夜行部落」<http://blog.udn.com/jshengk/4679091>，訪問日期：2021年6月18日。
-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13年。
- ：〈冷戰·離散·文人：《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8期，2020年。
- 馮志強：《中國智慧的跨文化傳播——林語堂英文著譯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1年。
- 楊雪：《多元調和：張愛玲翻譯作品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楊聯芬：〈成長創傷與家族史書寫——談新近出版的張愛玲自傳小說《雷峰塔》、《易經》〉，《中國圖書評論》第7期，2011年。
- 趙稀方：〈論老子思想對胡適的影響〉，《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5年。
- 劉紹銘：〈張愛玲的中英互譯〉，《愛玲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年。
- 歐陽哲生：〈胡適與道家〉，《中國哲學史》第4期，1997年。
- 蔡登山：〈完不了的「林語堂夢」〉，《傳奇未完——張愛玲》，臺北：天下遠見，2003年。
- 蔣美紅：〈後殖民視域下張愛玲與林語堂的跨文化寫作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30卷第1期，2019年。
- 顏健富：〈「國民」想像：從晚清到魯迅小說的「新中國」與「鐵屋子」〉，《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 蘇偉貞：〈私語張愛玲：張愛玲的家庭劇場與家庭運動〉，《淡江中文學報》第27期，2012

年。

- [英] Botting, Fred, “The Gothic Production of the Unconscious”, in *Spectral Readings: Towards a Gothic Geography*. Eds. Glennis Byron and David Punter. London: Macmillan, 1999, pp. 11-36.
- [加] Deaville, James, “The Many Lives of *Flower Drum Song* (1957-2002): Negotiat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in Print, on Stage and on Scre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Music, Representation and Reception*. Eds. Hon-Lun Yang and Michael Saffl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pp. 119-136.
- [美] Gilbert, Sandra M. and Gubar, 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韓] Kim, Chang-Hee, “Asian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of American Empire in *Flower Drum Song*”, *Cultural Critique* 85 (Fall. 2013): pp. 1-37.
- [美] Klein, Christina,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波] Kowalska, Teresa, “Tea, Ivory and Ebony: Tracing Colonial Threads in the Inseparable Life and Literature of Han Suy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0 (2000): pp. 21-32.
- [英]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Y: The New Press, 2013.
- [美] Wakeman, John ed., *World Authors: 1950-1970*. NY: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75.
- [荷] 高羅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著，吳岳添譯：《中國艷情——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臺北：風雲時代，1994年。
- [美] H. W. Wilson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hwwilsoninprint.com/index.php>，訪問日期：2021年3月26日。



**Telling an Atypical Chinese Story:**  
**A Study on Eileen Chang'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Fall of the Pagoda* and *The Book of Change* in the**  
**Transcultural Context**

Chao Chia-chi\*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Eileen Chang's (1920-1995) two-volum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Fall of the Pagoda* (*Pagoda*) and *The Book of Change* (*Change*) written in the mid-1960s, and explores Chang's motivation of developing the western reader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 through her bilingual writing practice in the novel. Firstly, the essay points out the paternal characters in *Pagoda* are intentionally represented as remnants of the declining China rooted in the Confucianism, and discovers that Chang, in *Change*, especially foregrounds the female issues by connecting the adolescent patronage's concerns with the Yin-yang gender concept and the philosophy of Taoism. Subsequently, by examining Chang's self-introduction published in the *World Author* series, it traces Chang's mentioning of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as the writing paradigm, arguing that Chang's target of writing *Pagoda* and *Change* was to clarify the western readers'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inally,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editorial discourse of *World Authors* not only portrayed Chang as an acclaimed Chinese novelist, but it also shaped Chang's bilingual writings as the successful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China. Through the textual and contextual exploration of *Pagoda* and *Change*,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novel is not merely Chang's autobiographical piece, but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ranscultural medium in which Chang transmitted her deep observation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o the internationally non-Chinese readers.

**Keywords:** Eileen Ch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The Book of Change*, transcultural, *World Authors*